

# 我的青年時代 (續完)

阮毅成

## 舒新城師道爾頓制

中國公學是有其光榮的歷史的。滿清光緒三十一年，也就是我出生的一年，中國留日學生，因為反對日本新頒的取締學生規則，認為侮辱中國，議決全體歸國。歸國的學生既多，遂發起辦一個理想的學校，容納這些抗議回國的學生。因為這學校含有對外的意義，歸國學生又有十三省人之多，故名為中國公學。

中國公學成立於次年的春天，其時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，已漸鬆懈。許多官費學生，多紛紛回去復學。而上海人士，初見一大羣剪髮洋服的新學生，自辦學校，多起猜疑。官吏指為革命黨，社會疑為怪物，故贊助的人很少。經費困難，學校遂陷於絕境。幹事姚宏業先生激於義憤，遂於四月六日，投江自殺，以身殉學校。遺書數千言，說：「我之死，為中國公學死也。」

中國公學此後歷經艱難，迭遭變故。我於民國十一年春入校的時候，校長是王敬芳先生，中

學部主任是舒新城先生。中學的教師，是：

國文 沈仲九先生

孫俚工先生

英文 王 靖先生

數學 周為羣先生

匡互生先生

歷史 常乃德先生

陶載良先生

植物 向大光先生

陳兼善先生

生物 蘇仲文先生

李尊庸先生

化學 張武成先生

美術 張武成先生

體育 張武成先生

沈先生本是我在杭州一師求學時的教師，我到了中公，他也新應聘到校。王先生字希和，福建人，翻譯了許多篇的印度泰戈爾的小說。周匡常陳各位先生與舒先生，都是自北京高等師範畢業不久而應聘來校的。周匡陶三位先生，後來在江灣創辦了一所立達學園。抗日戰爭中，校舍

被毀。勝利之後，想到杭州復校，陶先生曾來杭數次，終以物力艱難，未能實現。常先生字燕生，山西人。我自中公中學部畢業以後，才知道他是中國青年黨的重要負責人之一。民國三十五年，制憲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，他與我皆是代表，曾晤談過數次。不久，他就逝世了。向先生是湖南人，抗戰初期曾在浙江任溫嶺縣縣長，此後就沒有消息。陳先生於抗戰勝利後就到臺灣，初任臺灣省立博物館館長，後在臺中東海大學任生物系主任，去年方行退休。李先生於三十五年冬季，我到南京出席制憲國民大會時，曾在南京見到幾次。

舒新城先生到校之後，試用道爾頓教學制，係從一二年級開始。我是插入三年級的，並不在試行之列。但我到中公之後，就抱定宗旨要好，用功，除校中的團體外，決不參加校外的活動。因以幾個月下來，各位教師都認為我是可以造就的。除教室中的師生關係之外，並經常於課餘時間向各位教師執卷問難。其時，各位教師都很年

青，有好幾位尚未結婚。他們都住在學校中。大公的學生宿舍，分爲天地玄黃四號，天地兩號爲大學部學生的，玄黃兩號爲中學部學生的。宿舍係兩層樓房，每層兩行，中有走道，共有二十多間。教師住在每層的兩端，每人一大房間。學生則每兩人一間，寢室與自修室在一起，十分寬敞。窗外有長的天井，植有樹木。其時並沒有內務檢查等名目，但同學均愛佈置整潔。房中時有鮮花，牆上貼有美術圖片，互相競爭，力求美觀。同學找教師，至爲方便。教師也經常到學生房間中來，隨便談天。校中規定晚上十點鐘熄燈，但師生常常藉着月光，或燃上一支小蠟燭，一面剝花生米或橘子，一面笑談不已。有時候就在沒有月光也不燃蠟燭的情況下，在黑暗中爭論問題，相互辯難。後來，我升入了大學部，師生間的情感，也是同樣的密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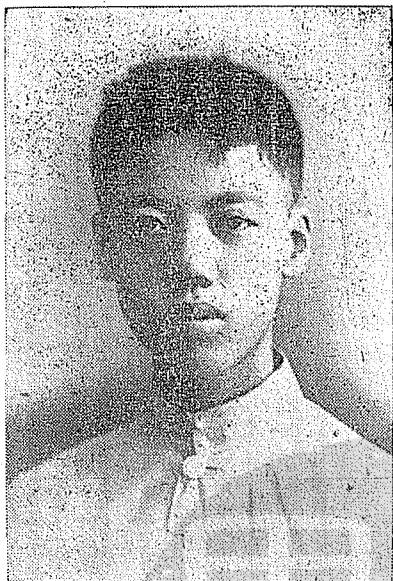
### 演出話劇歡樂童會

舒先生向學校建議將吳淞中國公學附屬中學，改名爲吳淞中學，以期與大學部脫離。結果是名稱改了，却脫離不了。因爲校舍在一起，學生生活在一起，是無法絕對劃分的。其時大學部只有商科，學生多係來自上海工商界家庭的子弟。而舒先生所教導的中學，則學生係來自各省，尤以四川湖南廣東各省的爲多。大學部與中學部，各只有學生一百多人，彼此之間，極容易熟悉。在我到校後不久，校中要組織學生自治會，當然希望大學部與中學部合組，並由大學部的同學，多負領導的責任。中學部的教師與學生，則希望分別組織，校中表示不同意。中學部教師常乃德先生，首先在中學部出版的旬刊上，發表主張，他要用英國基爾特的方式，組織學生自治會。我乃也在旬刊上發表意見，主張要用英美的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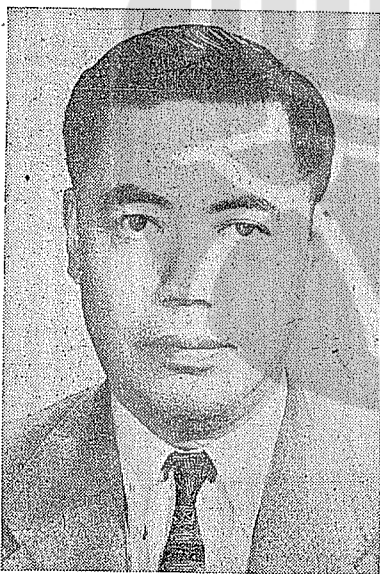
主議會方式。常先生不贊同，遂與我在旬刊上展開了筆戰。他和我各寫了好幾篇文章，頗引起全校的注意。校中決定採納我的意見，用民主議會方式。但大學部與中學部既同在一個學校之中，仍只應組織一個學生自治會。我在學生自治會中，當選爲出版部的部長。各位教師又鼓勵我們，自己組織許多社團，如維美劇社、童會、數理化研究會等，參加的則以中學同學爲限。

維美劇社在校中公演過話劇「父之回家」，由我飾劇中的賢一郎。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登上舞臺。童會，沒有會章，也沒有經費，每次推定一次的幹事，排定節目，定期歡樂。陳兼善先生是對童會始終最爲熱心的一位。如果沒有他的指導與支助，可能不會維持得那麼長久。

數理化研究會自成立之日起，卽由我擔任書記。周爲羣先生是最熱心指導的教師。我的數學習題作業及每次考試，每次均爲一百分之。周先生



青年時代的作者



作者近影

認爲我日後應該學數學，他指導我研究非歐幾里得的幾何學，我寫的有關文章，他鼓勵我投稿到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藝雜誌，居然登載出來。一個中學未畢業的學生，很難有機會在純學術性的雜誌上發表文章的。我當時的欣喜與對於學習數學的興趣，都提高到極限。他又鼓勵我學習相對論，我乃與北京大學的教授夏元璪先生經常通信，承他給我很多的指導，並介紹我讀了許多淺近的英文原本。夏先生是當時

國內研究相對論的權威，他並未因為我只是一個中學未畢業的學生，而吝於千里之外，予以教益。可惜我後來放棄了數學與相對論，真是有負周夏兩位先生的期望。

中國公學係在吳淞砲臺灣，校舍恢闊，建築壯麗。四週有小河，大門前架一木橋，以通大路的鐵路，半小時可達。中有吳淞鎮、蘆藻濱、張華濱、江灣、天通庵各站。但是我們却很少到上海去。如果去上海，除看親友外，就是爲了買書。我在中學時讀書的興趣甚濃，所讀的書範圍極廣。如果買外文書，就到伊文思圖書公司。買中文書，就到棋盤街一帶。我並且與日本東京的丸善書店通信，每有歐美的新書出版，他們可以將書寄來，我收到後再匯錢去。如果不要，也可以將原書退回，不收一文錢。我與同學們將書看完之後，每人都將自己所買的書，捐給學校的圖書館，並且從來不在書上簽下自己的名字。其時物價低廉，我每去上海一次，連來回車票及在上海吃午飯吃點心等，還化不了一元大洋。在平時，如果要在上海買日用品或是送信投稿，則校中有一位職員，他姓汪，安徽人，人人都稱之爲汪買辦。他每天早上到上海去，晚上回來。任何人都可以在前一天晚上，將要買的物品或是要做的事，開一張單子，連錢交給他。他第二天晚上回來，事事有交代，筆筆都清楚。比自己到上海去辦，既省錢、又省力。

## 海岸如聲勇者樂海

中國公學距砲臺灣車站約三華里，只有一條可以行人力車的小路。我們每天晚飯之後，照例到校外散步。或者走到車站，而後穿過車站到海濱，來回約六華里。或者先走到吳淞鎮，再走到砲臺灣而後回校，那是一條三角形的路線，來回約十華里。少時脚力健捷，最多一小時，已足够了。如在星期假日，則到寶山縣城去，來回不到二十華里。這是沿海的小縣，也是海口的前衛。寶山縣城較海塘爲低，城中沒有市面，只有零星的幾家小店，和一些住戶。站在城牆上，站在海塘上，可以看到洶湧的波濤與無窮的遠景。也可以看海上來往的船，以及船上的人。其實都並不相識，却又好似極爲熟悉的親友。

砲臺灣係軍事地區，晚上戒嚴，我們並不知道。學校大門每晚開十時上鎖，門外有河，任何人不能飛越。我到校不久，就和同學們商議，想在月白風清之夜，到海濱去看一夜中不眠的海水。或是在天色黎明之前，去看一次海上的日出奇景。終於有一次，約好了七八位知己，事先說通了門房老蔡，因為他就住在大門內門房中，管着大門鑰匙。我們着了平底布鞋，衝枚疾走，在午夜溜出了校門，直趨砲臺灣車站。這是一個仲春之夜，月色清瑩。我們剛看到月光下的大海，閃閃有光，就被守衛的軍隊喝住，要問口令。大家只好立定，士兵看到是一羣衣衫不整的大孩子，又都是徒手。問明了來意，一位山東老鄉便將已經舉起來的鎗放下，哈哈大笑說：「這有什麼可看的！我們在這兒一年看到頭，看都看厭了！」也沒有半夜出太陽的，你們也來得太早了

！我們經他這一喝一說，游興已經掃盡，便打道回校去了。但走到校門口，怎麼樣也無法叫醒在熟睡中的老蔡，起來開門。因為他只知道我們要到天亮才回來，決沒有想我們回來得那麼快。校門又高，我們也無法翻進去。大家只好一敲門都不應，倚杖聽江聲，三三兩兩地靠在校門前木橋的兩旁欄杆上，等候老蔡。幸而天尚未明，老蔡自動起來有事，大家乃叫住他，開了校門。各人如飛般的，奔進了各自的寢室。

我在砲臺灣前後住了六年，看海看得多了，養成了我對海的愛好。海是濶大的，又是常常波濤洶湧的。多接近海，可以使一個人目光遠大，愛想那無盡頭的遠景。也可以使一個人胸懷之中，常常如萬馬奔騰，充滿了不平之氣。上下起伏，不吐不快。凡是能愛海的人，總是心懷壯闊，百川能容。孔子說：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，」我却要爲之增加一句：「勇者樂海。」

## 「新的我」的真精神

民國十二年的國慶節，我獨自到蘇州旅行。十一月，又隨學校的旅行團，到南通去遊覽，這都是我喜歡游歷的開始。我少時久居杭州，對於這同有天堂之稱的蘇州，早已嚮往。蘇州因爲沿太湖，河流如網，真是水鄉澤國。人家多臨水而居，風光綺麗。南通是張季直先生從事工業建設的地區，我很欣賞觀音閣中所懸的手繡五百幀觀音大士像，皆着男裝。我也很喜歡城南的五個公園，彼此相距不遠，曲水相通，可以泛舟。水旁有躍龍亭，水中央有萬流亭。我們到南通的第二

日下午，一部份的師生在亭中開了一次同樂會，真正是少年狂歡，盡興而散。

我在中公中學部的時候，除努力讀書外，仍勤於寫作，民國九年暑假中，校中的旬刊改為週刊，雖在假期，照常出版。我是經常的撰稿者，直到畢業為止。又為悟社叢刊，寫讀書報告，也間有文藝創作。我又經常為杭州的婦女旬刊寫稿，鼓吹女權，間亦為寫文藝，從未領過稿費。婦女旬刊的創辦人是何致遠兄，他的舅父經壽庵（家齡）先生，江蘇句容人，於民國十年至浙江任高等審判廳廳長，率其同到杭州，住在興忠巷。致遠兄只讀過私塾，未進過學校，比我大幾歲，為人至為瀟灑。他贊成白話文，提倡男女平等，便將他舅父給他的零用錢，獨資獨力辦這樣一個刊物。而這一刊物的高稿的，與閱讀的，却多為男性。其時風氣尚未大開，女子學校甚少，女子出外求學的更不多。我們其時都只是中學程度的，所知實在有限，居然放言高論，自命為社會的前驅。婦女旬刊每期有插圖，皆係鼓吹女權運動與男女平等者，多由胡亞光執筆，頗多新意。民國十六年春，國民革命軍軍底定杭州，經先生解職，致遠兄的經濟後援斷絕，婦女旬刊乃只得停刊。計共出版了六年，每年三十六冊，內容頗屬可觀。不久，經先生返句容原籍，致遠兄亦隨之同去。他最初尚與我通信，其後就不知其情況了。但是他始終未曾結婚，這是我知道的。以一專門鼓吹男女平等早年就創辦婦女刊物的人，却並不結婚，不能不說是一件奇事。

民國十二年五月，我們所組織的悟社，改名

為新吾學會。悟社的組成份子，原來都是杭州的中學生。我到吳淞之後，增加了中國公學中學部的同學，大家遂同意改名。先將悟字拆成爲心吾二字，再從心吾想到了新吾，含有日新又新的意義。在改名的時候，我報告學校中的教師常乃德先生，常先生就在當天晚上，爲我們寫了一篇「新吾的意義」，作爲我們的宣言：

「在一切新機播蕩的潮流內，偶發又發生了一個團體。我們本不敢又掘起這具新字的大招牌，但是，小則小，它也還自有它的一線的新機。這新機與世界一切偉大的新潮，淵源一脈。譬如溪流雖然微渺，與大海水同歸一味。因此，我們不敢妄自菲薄，乃於其新生之第一日，而祝其名曰新吾。我們覺得在空談改造社會改造世界之前，改造各人自己，是首先要走的一步。我們不敢說要拿這小小的團體，來創造如何偉大的新潮，但我們却很願意借這個機會，來澈底洗刷我們個人內部未經洗淨的心靈。這是我們所以命其名曰新吾的第一義。

我們覺得自己雖然十分渺小，但終久在微弱的心靈內，已經種下一縷蕩漾的新苗。我們自己承認是在新的旗幟之下掛了號的人，或者至少已經確定了如此的趨向。爲表明我們希望作一個新的人起見，因此組織這個團體。這是我們所以命其名曰新吾的第二義。我們都是一無所有的人。我們一沒有智識，二沒有力量，三沒有衆多援助的朋友。我們所有的，只是一點赤誠的愛好新機之心。我

們憑藉這一點誠心，願意替浩漫的新潮中，添一絲半線的气力。

我們不敢希望別的，我們只希望永遠保持這種『新的我』的眞精神，則雖然引不起重大的回潮，我們也已經感到成功的愉快了！」

民國十二年夏季，我自中國公學附屬中學畢業。舒先生雖則曾一度將校名改為吳淞中學，不久又仍爲學校當局改回來。在學生方面，也希望有中國公學的名義。較之前此未見經傳的帶有地方性的吳淞中學，要好聽得多。

畢業考試完畢，暑假開始，同學就各自回家。等到成績計算完畢，就不能再回到學校，舉行畢業典禮。所以校中就將各人的畢業文憑，分別寄發。其時，文憑不需要教育行政機關蓋印，只要由校長與主任簽發就可以了。我在杭州家中收到文憑，是夏天的一個晚上，拆開一看，竟是全班的第一名。先父及家人，均十分欣慰。

六月，我與中公中學的同學舒廷浩兄，合辦淞陰文藝雜誌，只出版了一期。民國十三年春，又與吳傳霖兄合出了一本詩集，名爲栖霞集，只有薄薄的十六頁，却用連史紙印，線裝。

### 初入法校再回中公

中學畢業之後，就要準備升入大學。我想習數理，而先父則希望我習法律，以繼承先祖父與他的衣鉢。因爲我是獨子，如果我不習法律，則我家的薪火，便將失傳。我只得放棄我自己的志願，而服從先父的決定。不料正在國內各著名大學舉行招生考試的前幾天，我竟因在家中貪食蕭

山楊梅，而得了傷寒病。楊梅是無皮無毛的，容易爲細菌所寄生。傷寒病在當時無藥可治，完全靠病人自己的休養與家屬的調護。況復時當盛夏，我臥床七個星期，方才痊愈。頭髮全部脫光，兩足軟得像棉花一樣，不能行走。

先父在我病中，買了中文與日文的許多研究傷寒病的書籍，自己研究。並不斷的與我的醫師錢潮（字君胥，杭州人，其時甫自日本千葉醫科畢業回國，在杭業醫），討論治療與護養的方法。先父平素篤信西醫，凡有建議或介紹中醫來爲我治病的，他皆予婉謝。先父並買了隨園詩話與西湖游覽志等，每日下午在我床旁，講給我聽。

等我病好，已經十月，各大學的考期均已過了。其時杭州尚無大學。要讀大學，最近要到上海，遠一點要到南京，再遠就要到北京。我病後體弱，自也不宜遠行。但我又不能失學，先父乃與浙江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周伯雄（子豪）先生商量，特別准我補考入學考試，取入該校的預科，校址在馬坡巷。先父於滿清光緒三十二年，初到杭州，就是在該校擔任教員。民國十年秋，始因體弱多病，將教課辭去。

周校長是浙江諸暨人，抗戰勝利之後，有人誣告他會做漢奸，我力爲辯白，始得免於涉訟，這是他當年所未會想到的。

我在浙江公立法政預科讀了一年，便轉學到上海，仍就回到了中國公學。這一次是進了大學部，爲政治經濟系二年級。這因爲一方面，先父始終認爲我應該進大學，二方面是因爲民國十三年九月一日，浙江督軍盧永祥與江蘇督軍齊燮元

，在浙蘇邊境，發生內戰。浙省內各級學校，因時局動盪，不能開學。乃藉口謂天氣炎熱，延長暑假。而先父亦因爲齊盧之戰，率全眷避居在上海公共租界卡德路祥福里。中國公學則因爲吳淞的校舍，處於戰區，臨時遷移到上海公共租界靜安寺路海格路口，租用民房開學。中學部已宣告停辦，原任主任舒新城先生，改到中華書局編譯所任事。校中當時只有大學部商科，又從商科中劃出一班，約二十餘人，爲政治經濟系。中國公學雖則沒有法律系，但先父認爲該校是我的母校，而教授人選甚爲整齊，所以命我去應轉學考試。校中知道我是本校附中的畢業生，當即宣布錄取。

從卡德路到校中，可乘一路電車，來往甚爲方便，所以我是走讀生。民國十四年三月九日，先父以戰事已停，乃率全眷回杭州，我乃住到民厚北里七十二號的學生宿舍中。這也是校中租用的民房，原係供住家用的。每四人到六人一室。讀書環境，當然不及吳淞的安靜，但是校中讀書的風氣，仍然很好。

三月十二日，國父在北京逝世，舉國震悼。校中的追悼會，由我與數位同學負責籌備，當時，有好幾對輓聯，是我做的。

### 五卅慘案齊聲納喊

四月，學校遷回砲臺灣。我第一次回吳淞，因爲火車開行，在戰爭之後不能準時，乃從上海天通庵站，雇一羊角車（即獨輪車）前往。走了半天，方才到達。因爲中學部停辦了，只剩下大

學部，校舍乃更覺寬敞。我從前住的是玄字號樓上，現在移到最前面的天字號樓上，仍係每兩人一大間。窗前樹木成陰，窗下繁花似錦。讀書的環境好了，讀書的效率也高了。其時校中的功課，多數都用英文直接講授，課外還指定要讀許多參考書，也大多是英文原本。

五月三十日，上海公共租界，發生慘案。我們因在吳淞，到晚間才知道。這一天下午，校中學生自治會舉行遷回砲臺灣後的正式成立典禮，楊杏佛先生代表同學會蒞校演講。晚飯後，原定舉行遊藝會，我們正在會場佈置一切，而學校的籃球隊從上海與大同大學賽球後回來，報告了慘案的消息。乃決定將遊藝會停止，改開學生自治會的臨時大會。決定派人到上海調查真相，並與上海各校，採一致行動。

第二天上午七時，校中就鳴鐘百響，召集全體同學出發。全校分三批動身，均乘火車。約定於下午一時，在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門前集合。每十人爲一隊，我列在第一隊，隊長龔豪，即昔年在杭州第一師範與我同時考入中國公學附屬中學者。我隊到了上海的浙江路日昇樓，見先施與永安兩大公司均未開門，而各校學生已雲集在南京路兩旁。我們西行至勞合路，又東行至河南路，再回到先施公司門前。英國巡捕與印度巡捕，均已持鎗巡邏，如臨大敵。下午二時，有學生糾察隊來沿途巡邏，謂學生總部設在新旅社。另有任交通者隨時來傳達消息，以右手小指染有藍色者爲證。旋又通知，今日以「下雨」兩字爲口令。於是各校學生乃開始分發傳單，內容一爲釋放被

捕學生，一為打倒帝國主義。我隊立於時新昌門首，店東備有茶點招待。忽然大雨傾盆，衣履盡濕。三時，又接通知，向南京路東端惠羅公司門前集合。是時自四川路以迄新世界，各校學生多向兩旁店舖分送傳單，並請求商店罷市，以為聲援。我們乃再由四川路向北，至寧波路，又轉向南，遇有停在路旁的汽車，就將傳單貼上。因正在下雨，並不需要漿糊。我們走到江西路四馬路口，有一華籍巡捕來謂：前面有巡捕房，經過時要小心。我們只見捕房門前戒備森嚴，鎗口向外，並無其他動靜。再轉至二馬路大新街，到了一樂天門前的電車站，各校學生皆立於店舖的樓上，從樓窗口將傳單向下拋擲，空中五色紛飛，路人紛紛鼓掌。但天正大雨，傳單一着地面，即被潑踏。英國巡捕雇了許多小工，沿路清掃，却掃得愈快，丟得愈多，巡捕亦無可如何。我們走到石路，有一學生騎自行車來，先說「下雨」，我們知係口令，旋謂奉總部密令，不可大隊集合，須隨聚隨散。再則演講時不可過激；萬一被捕，也切勿抗拒。又謂上海總商會正在商議罷市，可以前往參加請願。我們乃乘無軌電車赴天后宮橋，會場中已告人滿，冒大雨而散立於花園中者，尚有二三千人。到了五點鐘，准各校加派代表入內交涉，我乃得進入室內，全身業已濕透，亦不覺得肚饑。到六時半，商會才同意從次日起罷市。會場內外，乃三呼中華民國萬歲。我們回到砲臺灣校中，已在晚間八時。回到學校後，始知同學中有人被捕，有人受傷，有人失蹤。但仍公決明日繼續出發，監察罷市是否澈底。

六月一日午十二時半，我們又到了上海先施公司門前，由外國商團武裝防守自新開路至泥城橋一線。自二馬路至大新街，則用馬隊驅散行人，因而傾跌者甚多。我們一隊則被派在北京路以迄福州路一帶，擔任巡查。遇有私行開市的商店，則予以勸告。這是在上海最熱鬧的大道南京路的兩旁，也是紹興幫銀錢兩業的集中地。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，則奉上海工部局的命令，要逮捕在街上巡察的學生。一則我們穿的是便衣；二則我們對這些馬路的里弄，比他們熟悉，可以隨時分散，隨地穿越。印度巡捕與我們大捉迷藏，並未曾捕得一人。

這一學期，一直罷課到放暑假，未再上課，大考也沒有舉行。暑假之後，我們當然地升到了大學三年級。

### 平民學生壽登花甲

我在中國公學大學部求學期間，仍然愛好寫作。校中學生自治會的刊物白虹半月刊，推我主編，撰稿的皆為同學。校外則經常向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各種雜誌投稿，大多數均被採登。我又因校中教授俞頌華先生的鼓勵，為上海時事新報撰寫政論，並經常向該報的副刊投稿。俞先生多事先予以指導，並有時為我潤改。我們又在杭州的浙民日報，以新吾學會的名義，出版新種子週刊，作為該報的副刊，共出版了一百三十五期。後來又增加了一種新芽週刊，表示種子已經發芽了。這兩種週刊，我也曾幾次擔任主編，更曾寫過不少的文章。我曾保存有合訂本全份，於民國五

十三年雙十節在臺灣贈送給中央圖書館典藏了。新吾學會又曾出版過新吾彙刊（年刊）及新吾旬刊，刊載會員的讀書報告，也均係由我主編。可惜這些出版物，都因連年戰亂而無存了。

民國十五年十一月，校中的學生自治會開辦了一所平民學校。由我們志願擔任教師，而以校中的工友及學校附近的失學人民，包括成人及兒童為學生。上課時間是在每天的晚間，課堂即利用學校原有的課室。教師均盡義務，不受任何報酬。講義書籍，均由我們捐送。茶水電費，則由學校負擔。開學之日，我致開學辭。題為：「恭喜平民學校。」我說：「中國公學在吳淞建立了二十年，為什麼對於附近農民的生活，絲毫沒有改進的影響？這不怪老百姓的保守性深，而是我們的啓導力淺。」我在平民學校擔任成人部的國文教課，並改作文簿。又，自己編講義，自己寫鋼板，自己油印。我班有學生六十七人，男女皆有。其中最年長的，已六十歲。

我在大學部求學的時候，又曾一度代殷壽光同學到上海北四川路愛國女學講授西洋史。愛國女學是蔡元培先生等於清末創辦的，殷君一面在中國公學求學，一面在該校中學部任課。那一次，因為他生病，所以要我去代課。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上講臺，而為人師。平民學校，則已為第二次。

民國十五年冬，國民革命北伐的隊伍，已經進入了浙江。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，東路總指揮何應欽入杭州，向上海推進。砲臺灣於是又成為戰區，學校於寒假後不能開學。幸國民革命

軍，旋即光復了上海。四月，中國公學的新任校長何魯到校，勉強上課。六月，我們一班就舉行畢業考試。何校長只求早日將應屆畢業生送走，所以在考試之後，既沒有公布畢業成績，也沒有舉行畢業典禮，便每人發給一張不列名次的畢業證書。同學們也歸心似箭，就此各散。本來，上海各大學每年畢業班，總要編印一冊紀念集，各校且互相競賽，力求精美。中國公學以往也每年均有編印，獨我們畢業的那一年，適在北伐戰爭與學校改組之後，竟付缺如。

我在中國公學大學部求學時期的教授，有：

- |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|
| 政治學  | 俞頌華先生 |
| 政治名  | 張東蓀先生 |
| 著選讀  |       |
| 經濟學  | 劉秉麟先生 |
| 哲學   | 高陽先生  |
| 國際公法 | 謝冠生先生 |
| 數理經濟 | 陳伯莊先生 |
| 經濟地理 | 童遜瑗先生 |
| 英文   | 郭德華先生 |
| 體育   | 楊盤西先生 |

### 血湧江紅虹貫日中

還有許多位，或者是兼任的，因時間太久，已記不完全。俞先生是江蘇太倉人，張先生是浙江杭州人，劉先生字南陔，湖南人；他的尊翁在抗戰期間，在桂林良豐任廣西大學校長，我曾於經過桂林時，兩次到良豐去拜訪過他，他後來就在良

豐逝世。謝先生是浙江嵊縣人，數十年來，我經常有機會向他繼續請益。陳先生是廣東人，抗戰勝利以後，任京滬杭鐵路局長。大陸陷匪，避居香港，著作很多，前幾年在港去世。童先生是江蘇人，抗戰時在福建主持貿易公司，曾常常通信，此後即不知其何往。郭先生是廣東人，抗戰勝利，任外交部駐香港外交特派員。其後英國承認共匪，特派員撤回，聞他現在在夏威夷東西研究中心任教，近年已告退休。楊先生是江蘇武進人，不慎在砲臺灣下火車時，為火車頭撞死，還只三十歲左右。同學們曾募集款項，贈慰其遺孤，由我送到武進他的家中，面呈給楊師母。

我在砲臺灣，自中學到大學，共住了六年。同學們所談的，多為各人對國家的抱負。尤其中國公學是具有革命歷史的大學，人才輩出。大家緬念先型，都要不負後死。在那一時期，固然沒有惡性補習，沒有劇烈的升學競爭，更沒有聯考。學校有選擇學生的機會，學生也有選擇學校的自由。却也沒有人談戀愛，沒有人談電影，也沒有人會跳舞，或是打撞球。人人布衣素履，却都自以為「斯人不出，如蒼生何！」我們最大的享受，就是晚飯之後，在海濱散步。我最愛坐在沙灘上，看落日，看征帆，看海鳥飛翔，看漁民晒網。我們最大的笑聲，則是在上海各大學的足球錦標賽與國英語演講及辯論比賽時，我們去做啦啦隊時所發出來的。我只曾在校中的辯論比賽得過優勝，却未參加過校際的比賽。

大學畢業，我回到杭州。新吾學會的會員，也都各自分散，學會也就無形中解散了。民國十

六年十一月底，我曾寫過一本從浙江新潮到新吾學會，由杭州百合書店出版。

最後，我願寫下中國公學的校歌，可以代表我們青年時代的呼聲：

隔岸起飄風，浪打吳淞。  
血湧江江紅，白虹貫日中。  
多少少年英雄，以學為光榮。  
鍛鍊身心，胼胝手足，擔天下之公。  
民國五十九年重陽節，寫於臺北。

## 訪歐織影

莊心在著

定價新臺幣貳拾元

經濟日報社印行

中外雜誌社代售

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  
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  
寄書